

晨光社与刺汪案件

华克之

华克之（即张建良），江苏宝应人，今年八十四岁，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生在当时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刺杀汪精卫的案件时，他是晨光通讯社社长，刺汪案的组织者；刺汪英雄孙凤鸣是该通讯社记者。本文在此发表以作为对英雄孙凤鸣的纪念。

孙凤鸣，一九〇五年生，铜山县黄集乡小合子村人。

——编者附注

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出一则消息，用特大号字体标题：“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五个月后的中央社在回顾这一事件时，仍然以千钧之重落笔：“不特举国震惊，即全球各国亦莫不十分关切，此诚我国历史上政治暗杀稀有之重大案件。”中央社在案发初期，还特别渲染此案的政治背景，说“刺汪的幕后主使者完全是在福建组设人民政府失败的陈（铭枢）、李（济琛）”，“意图颠覆民国”，并称“凶手孙凤鸣”已两次刺蒋，而这次由于蒋介石不在摄影场所以身免。

这一案件的前因后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一篇资料能把它说清楚。国民党的档案也没有确切的记载。这是

因为国民党愿花十万重金追缉我华克之，但始终没有把我抓住，因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孙凤鸣是奉胡汉民派系中刘芦隐的指派，也有人说是蒋、汪交恶蒋派人干的。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

刺蒋、汪案产生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来，又陆续订立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何梅协定》。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指出：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就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蒋介石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攻城掠地杀戮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惜打拱作揖，把大好河山连同子女玉帛一律奉送。回过头来却露出一副狰狞面目，对处在水深火热中不甘驯服的民众进行血腥镇压，千方百计斩草除根。

这就是刺蒋、汪案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

二

刺汪英雄孙凤鸣（原名孙凤海），徐州府铜山县人。初识之于我的故乡安宜，时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之间。当时由于二陈（CC）追索我甚急，“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游击未成，分手时彼此宣誓：“抗日反蒋到底！”一九三〇年底，他偕夫人崔正瑶来沪，另赁居之。当时的年龄

约在二十四、五岁。为应付世俗，我们称他为四弟。在军阀混战时代，他当过小兵。内战给他启示，他诅咒内战。他父亲是个雇农，他仇视地主。出生以来，从未接近过财富，他更加鄙视金钱。练得一手绝好枪法，百发百中。由于家贫，只上过几个月冬学，书本知识不高，但外表蕴藉风流，身材修伟，白净的皮肤，纯厚的眼睛，低声的谈吐，使人乐于接近。我介绍张维、陈惺子与他相识，初时还有些腼腆，时间久了，方始自然。他恨自己缺乏知识，偷偷买了几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补习中文。有时请人讲解《申报》，学习批评时事，发言日渐中肯。论及日寇侵略、蒋逆卖国时，攘肩叱咤，目眦尽裂，顿时又判若两人。他的夫人，真世之佳丽也，思想深处，颇不平凡，认识到孙凤鸣慷慨忠义，倾心许之，遭到挫折时，态度安闲，一无埋怨。

一天，在上海孙凤鸣的小屋子里，我和陈惺子、张维、孙凤鸣四人开了一次会（遇事如此，时常有的），陈惺子的意见：“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都曾反对过蒋介石，都失败了（或半失败了），此次李、陈、蒋、蔡反对蒋介石及其政府，又以失败告终了。事实证明，欲求革命成功，只有参加共产党，实践马列主义，耐心地做群众工作，等待国内国外条件成熟，才能消灭蒋介石及其卖国政府，中国革命才能有把握。中国革命与国际并无不同，处处意味阶级斗争，绝不是蒋介石个人问题，而是要消灭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问题。”张维发言：“按照惺子的说法，‘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中国革命的成功，还是个遥远的事情，不论采取任何手法，凡是能够损害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

的，都是革命，都是与革命有利的，不必拘于一种形式，以及阶级斗争这个公式。”孙凤鸣发言：“我跟你们学了很久，我仍是个老粗；老粗的话，也可以说给你们一听的（其余三人一齐欢呼）：蒋介石既是一个空前政治大流氓，是代表各个反动阶级的，是最大的反革命，又是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总代表。我们对于这种人，如此宽容了几十年，不能纠正他，铲除他，任他胡作非为，还要尊之为领袖；这不是他的罪过，而是我们的罪过和懦弱。假如有人把他一枪打死，对于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要顺利得多了吗？福建这一幕又失败了，形势愈加迫切。一枪打死蒋介石，为了中国革命较为顺利，为了穷人提前解放，为了我的父母和妻侄，迅速建设新的中国，我愿承担这个任务，决无犹疑。我是值得牺牲和甘愿牺牲的。而这种牺牲正是最大的创造！我对我的认识，绝不后退。我已和我的爱妻商谈过了。假如当时我一直没有退伍，必定死在内战之中，那是等于一条死狗，不如和蒋介石一拚而死，才是死得其所。人都是要死的，为民除害而死，最有价值。我的妻子每当谈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她就哭了，但每次她都同意我这个说法。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们为我从这个方面设想吧！……您们三位，都是我的兄长，我的性格，您们是深知的，我办不到的事，或者我不愿办的事，我绝不发言。”他说到这里，我们四个人，一齐哭了。他又继续说道：“对于这个空前的反革命，千百万人来牺牲，打他打不倒，而用我一个人和他一拚，是十分值得的。否则，让他溜到外国人的租界里，或让他溜到外国去，悠哉悠哉，一有机会卷土重来岂不可惨！，对于这种人，独不可以一枪打死，这个道理我始终弄不懂。”

三哥（指惘子）越说我越糊涂。但是我不愿（不耐烦）再糊涂下去了。”说话时，两眶热泪又涌上来了，大家说不下去了。

我当时的意见：从马列主义，从中国共产党历次所发布的理论和教导，我是同意惘子的；据现实国际国内的情况，我又是同意张维和凤鸣意见的。我总是在他们三人中间徘徊。惘子是地下党员，是有组织的，刺蒋这个事件，我们都同意他向党请示，违反共产党的事情，我们是绝不干的。活说到这里，我们都默无一言，静待着惘子的回音。适时，李怀老（李怀诚）从杭州回到了上海，和我们又聚首了。他说：“我两度特派浙江军（第一次是中山先生委任），两度都无疾而终。……我认为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力量，都在蒋介石身上体现出来。因此，一切革命行动，应首先把蒋介石处死……可惜我年纪太老，不然我就去专干五步流血的工作。一切后果我是不计较的。”他这一席话，打中了我们几个人的心灵，我接着向惘子说道：“我们拜托你向组织请示，待组织的高见，我们再从长计议吧！”

我们思索酝酿了数日，最后由我和惘子把意见集中起来，托惘子代表我们，向党描述我们的心灵。不到十天，惘子即得到答复，据惘子说，一位军委答复是：“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不能鼓励人们去做暗杀工作。这些人的品质是好的，希望说服他们，参加我们的工作不是更好吗，……”当天晚上，惘子对我们三人作了传达。我们均不同意这样的答复。我们不是暗杀，是明杀。蒋介石有数百万三军保护，我们赤手空拳，我们只有祖宗的遗训：“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今天的每一位中国人，都有杀死蒋介石的任务。

我们之杀死蒋介石，是充满了希望的，是有其丰富内容的。蒋介石一死，各地军阀必然各霸一方，矛盾和空隙自然增多，共产党收拾起来更加容易。为此，便再叫惲子和那位军委进行讨论。仍是那位军委作的同样的回答。我们便不再请示了。

经过讨论决定：我出面去活动经费；陈惲子因有组织关系，仍留上海不与闻此事，以免株连，保存一些元气；为便于活动，了解蒋的情况，以报纸或新闻社的记者为好，记者上可和国家元首对座，下可与乞丐同流，所谓“无冕之王”是也。蒋介石不是在谈民权吗？就按他的集团的想法，写些不太肉麻、捧场的东西。遂决定组织一个通讯社，定名为《晨光》，虚拟我为社长（改名为胡云卿）；张维化名张玉华，任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孙凤鸣为记者。这样人员太少，惲子又介绍他手下搞社联的贺少茹（化名贺坡光）任采访主任。晨光社人员由上海迁往南京。

我由上海去了一次香港，活动了五千元港币，作为开办的经费。

当年在南京成立个通讯社，说来是相当严格的，负责人的详细履历、动机、背景、经费的来源、主要职工履历，立论的宗旨，每日拟发稿的次数、字中的保证人等等，必须填入中央社所发的表格之中受检。按照这些规章制度，似乎颇不容易立案。但蒋记政府除反共以外，其它似都虎头蛇尾，京中有不少通讯社，因有某要人撑腰，登记之前便可先挂牌，长年不发新闻，照样是社长、总编……。可是我们这个通讯社，另有崇高目的，定有非常严厉的后果，如何打通中央社这一关，当时颇费踌躇。正在进退维谷，怀老自告奋

勇，找到蒋的老师徐忍如，声称一位富裕华侨商人胡云卿，出钱协助几位青年从事新闻工作，宣传三民主义……迅速完成登记手续。怀老当年是一位士隐，当时是著名私立钟英中学校长、画家。徐忍如还以为是精神道义之交，自当遵命。当时，我们曾露出怕诛连他之意。怀老慷慨道：“这是放火烧山，我知道。为了铲除国贼；我不考虑我自己。”

三

晨光通讯社成立之后，我们的宗旨始终是中间偏右，替当局捧场，力求避免肉麻，使右派看到满意，左翼人士读到也不致恶心。为时不久，京中同行普遍知道，这个社是南洋华侨的资本，论其意识形态，多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多是崇仰孙中山先生的，不冒犯对蒋先生的尊严，对于祖国的文化，国际时势的认识，当然有着局限，是不足为奇的。京中虽有些左翼人士嘀嘀咕咕，但也不来深究了。我们事前已经安排好，说我们的社长胡云卿，是一个不知名的年高多病的小小富商，行动不便，大概是行将就木，老死海外了。因此京中社会里外同行，也就不再注意他了。

开张不久，即有人手不足之感，遂由怀老介绍一个姓姚（名莹）女记者来帮助工作。写报告文学，以能力而论，当然不及坡光、玉华，遂使她专跑京中社会新闻，力求减少将来的株连。

张玉华同志又介绍了一个谷子丰来社充当庶务。就因这一个败类，在事发以后，使我们许多毫无关系的（有关系的更不必说了）亲爱的同志、朋友、亲故死伤累累，使我四五十年來，时时念及肉跳心惊，涕泗纵横。这一惨痛教训，千古

遗憾。十数年后，张玉华同志侥幸出狱，就因此事闷闷而死。

初出茅庐的孙凤鸣同志，为了达到目的，他专心新闻事业，起初一直跟着贺坡光同志奔走侯门，或警卫森严的机关。拿出名片，有时被人出言不逊，或为其所阻，开始他还有些腼腆，回来一经大家解说，态度也随着变了，也会安慰自己了。他的待人接物，堪称是社中同仁的模范，从不无味的辩论，从不出言伤人。有时在工余饭后，偕一、二同志往咖啡馆或茶室小坐，他为人相当节俭，唯一的嗜好，抽些纸烟，顶高价的是美女牌。什么“大炮台”，“三炮台”等等名牌烟，他从未买过。有人问他，他常笑着对人回答：“我最喜欢这个女人的形象。”这种话出自一个忠诚老实的口中，确实逗人好笑。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只生了他和他的哥哥。他的侄子出生不久，哥哥就死了。他早就对我们提过，每月花费不得超过四十元。他的夫人在上海，他规定也不能超过四十五元。这两方的生活费，每月都是由我或惘子送的。关于对他的夫人政治教育问题，也由惘子负责的，因为他学有专长。我每月送钱多超过这个数字，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未对凤鸣同志谈过。因为凤鸣同志深深知道经济来源不易，他一个家庭多开支了，会使他不安的。开社务会议时，我对经济总有一次报告，来源不广，他是深知的。

自从这个社在南京组成以后，他的性格显得更加温和得多了，待人接物的时候，比以前更加谦虚。他深知本年十月（三四年十月）伟大的红军虽然开始长征，但一时仍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蒋介石这个家伙，还是值得他拚一命处死他的。他这一个壮举，是为千千万万人民做的，意义仍

是非常积极的，他愿拼此一死，使他的精神，永远流传在人间。他不饮酒，常常饭后龙井一杯。他就和玉华、坡光或者我漫谈起来。他当兵，官至排长，以他的文化和人事关系而论，他自知很难高升的，纵使高升，还不是和穷人互相自杀吗？高寿难过百年。总之一句，人总是要死的，但应该死得慷慨激昂，要光明磊落。某晚，笔者在上海他的蜗居，读到要离、聂政、专诸、荆柯、秦舞阳等刺客故事，他都认为他们可惜，可惜他们为某个人尽忠的，勇敢有余，见解不足。——凤鸣同志常常赞赏我们座谈会的分析，从中国现代史而论，再没有如蒋介石这个军阀的魄力，一手拿着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金钱与军火，一面团结国内所有的军阀，北自张学良、阎锡山，豫陕甘的国民一、二、三军，青海的诸马，四川各地各霸一方的诸侯，云南的龙云，广西李、白，广东陈济棠，一致听他的号令。在庐山团结这些各路诸侯，组织军官训练团剿共，日日夜夜和那些丧尽天良的政学系研究剿共。他说，当我想到这里，我的心胆皆裂，我一定要在蒋介石指挥剿共的时候，在他背后刺他一刀，我要他内脏从他背部流出，我方死甘心。

他的夫人是江苏仪征人，学名崔正瑶，当年约二十一、二，还有个十七、八岁的妹妹，名叫正琪，姊妹才貌相当姣好。在那个封建气味很浓的小城市里，素称一对“小家碧玉”。也曾有些富家浪子央人说亲，都被她的父母所拒，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些浪子。不知怎的当她听凤鸣说道在上海抗日战争，人民的爱国，士兵的英勇，她马上有些面红耳赤，缄默低首，若有所思，不久他们即成朋友。共中的道理，我也从未问过（也不必过问）。成婚不久，凤鸣来到我的故乡（两

地只一日路程)，言谈吻合，游击未成，相约上海重见。此次正是他践约而来。唯一的理由，就是大家谈谈，找找革命的出路。我们这四、五个人的唯一同点，从未替个人作过三个月的打算。

四

晨光社因中央社略给了些颜色，我们就借此机会，稍加自我吹嘘，即自成妙文。立论仍本原宗旨，绝少抵触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我们除了订购各个著名的新闻社的稿子以外，并订了许多报纸，务使晨光社的消息推敲起来有根有据，时间不落在同行的后面。在短期内凤鸣同志已成为熟练的新闻记者了。

孙凤鸣在这一幕悲剧中，他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自己非常明了，一到南京，他自己用橡皮特制了弹弓，时时训练射击的准确性，弹死、弹伤很多树林里的小鸟。有一天他弹伤了一只小喜鹊，在地上乱滚，吱吱哀鸣，我看他望着小喜鹊掉下眼泪，颇为不安，急问其故。他告诉我说：“城门还未失火，首先殃及池鱼，呜呼哀哉！”以后他遂用一张白纸，中心画了一个红圈，挂在墙上作为训练，射时百发百中，使得一二知己，共同欢呼，确似“百步穿杨”！他曾对我谈过：“我的一生，仅此唯一的本领（意思是百发百中），万不能因时日长久而磨损，成了废物。”听他的这些话，使人肃然起敬，也使人不禁潜然泪下！当我在南京将欲回沪时，他接到夫人一信，说是他的父亲从家乡来到了上海。他告诉我要回沪看他的父亲。我立即回答他说：“我社开张已久，环境很好，大流氓回来无欺，你也正好回沪一叙天伦之乐。

我们一道儿偕归，我也要清理了一下琐细，将去香港张罗筹款，同时看看尊父大人。”次日下午回沪。当晚即去拜访他的父亲。他一家四口，住在民厚南里一个小楼里。

他父亲是一位极其忠厚老实的农民，年在五十一—六十之间，满面风尘，皱纹很深，显得太辛苦了！种了地主几亩薄地，今年雨水不足，缴完了“四六”地租，余粮吃不到明年三月。即此一端，其他不言而喻了！他不知道儿子在上海是搞什么的，也不知道我做什么生意，他始终不敢动问。我们所谈，本已夹了许多谜语，他更不清楚了，也不敢随便举止。我邀老人去敬安寺一个中等的馆子里午餐，他看我拿了五个银元出来会帐，老实的庄稼人吓了一跳！连称“惭愧”。观其表情，我心里反而不安！稍后我曾听凤鸣说，他很想买些鱼肉，请我吃一顿午饭，但又不知道他儿媳妇烹调的本领，恐怕反而弄巧成拙，除了向儿子提了一下以外，始终未再出口。

我在上海住了五六天，和他们父子吃过三四顿饭，老人家看到都是我会帐，他更感不安。凤鸣随时对他解说：“他（指笔者）是有钱的资本家，会会帐是无所谓的。”他闻之只好默然。他父亲这一次在上海住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方回去的。离沪前曾有惻子同志送去一百五十元，说是他儿带给他的，老人家心满意足地走了。

五

当时那个暴君，仍在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南京的一切事务，由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用长途电话或军用电报请示，然后指挥。至于他的宋舅氏、孔连襟、陈其美的两个

侄子果夫、立夫，以及何应钦等等大员，按章办事，“官中府中，均为一体”，他可放心了。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我们在南京守株待兔，日感不安。在某次会议上，由孙凤鸣提议，贺坡光附之，拟在庐山设一个分社，打听消息，能得机会，便在那里解决问题。我于是去了一次庐山，想通过关系而实现。一入庐山，始知警卫森严。据一可靠消息：某一日之间，曾处死过三名轿夫，说他们是共产党员，要在行经绝命崖时，决与蒋同归于尽。此后更严加戒备了。暴君公余偕夫人散步时，一二里外即禁止行人通行。

我在那里化了一周的光阴，在最高领袖公馆四周徘徊过许久，除了便衣、特务、宪兵外，连那闻名中外的美龄女士也没见到。我虽苦思冥想，也没想出个办法。资斧有限，遂作归计。从新商量，只有原议：趁在京开什么大会时，凭一张特别出入证，当国贼们全体摄影时，使他坐着受惩，此外绝无妙策。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汪精卫一向在南京主持行政院兼管外交的，但仅是蒋介石的看门鹰犬，不知为了一件什么对日外交问题，和蒋介石起了冲突，胆敢闹起别扭（或许有日人撑腰），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跑到日本人侵略华北的海军据点青岛去了。意在挟冠自重。这一下被他打中了蒋介石的弱点，蒋介石果然大吃一惊，立刻起驾回京弥缝。我似乎记得这一次是坐军舰回来的。到了南京，似在挹江门外海军码头登岸，立刻坐上汽车，飞驰中央军校校长公馆。沿途施行戒严，文武百官多未来得及到码头欢迎。全部中军统特务和宪兵一起出动，外层还有警察巡逻，三步一军，五步

一警，保障他的安全。

我们的同志得到消息迟了一瞬。孙凤鸣同志马上换了一套较干净的西服，挂上晨光社的证章，密藏了武器，立刻出发。可是，这一次事出仓促，坐公共汽车赶到江边，我们尊敬的委员长已经坐在他的公馆里了。记者们也只能随其后望尘而已。

不几日，报上发表汪院长回京视事。当然是对日出卖利益，已谈判平衡。上海是个奇异的地方，也有不怕死的小报，透露一些内容，由这一次小小的风波，看来蒋汪投敌卖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仍有各派的利益冲突……而我们晨光社内部也不平安，因蒋逆回銮一事，引起小小的皱纹，似乎有什么人在说孙凤鸣同志“临事而惧”（古语“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原是赞美的意思，可能他只听到了上一句）。平时，他对于一般的事，是绝对宽容的。此时此地此说，他是绝对敏感的，引起了他的愤慨。曾为此事自动回过一次上海。在我看来，不仅是看望他的夫人，他向我谈了一些内部同仁一些流言蜚语。经我一番解释，似乎并未使他释然。使我暗暗吃惊！他肯定地说，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必定有一个决定性的表现。他并对我说，他在行动以前，安顿他的夫人到香港侨居；将他夫人的妹妹送回仪征岳家，以免诛连。同时表示他对亲人的永别。他和我这段谈话，非常地亲切、诚恳、悲壮。他是个顶天立地伟大的汉子！可是，我不敢、亦不便查究这些流言蜚语，只警告同志们：“出言吐语逻辑要完整，要照顾周围环境，扫除无所谓的人事是非。”可是，孙凤鸣同志言出身随，躬亲实践，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大约是三五年夏天，我们四个人会谈，仍由我首先声明：“在上次汪精卫辞职投入日寇怀抱，威胁蒋贼。蒋贼回南京时，孙凤鸣同志所以不能动手，完全是事出仓促，当蒋离开军舰登岸，沿途宪兵特务警察周密保护。坐的是保险汽车，连他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无原则的猛撞，只是送死，我们大家是绝不同意的。且蒋帮已漏出消息，本年冬初，必开四届六中全会，按照向例，蒋逆必定出席，我们不惜金钱巴结和中央社的关系，代取一张特别出入证，自易接近蒋贼。在他按照向例在摄影场上摄影时，坐在那里挨打，百无一失。”经我这样一说，消除了他们的胡思乱想，使他们的神经方始稍稍正常起来。

六

国民党中央宣布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全国的诸侯各怀鬼胎，迫于时势，自然一致响应届时出席。东北三省沦陷了，察绥沦陷了，华北五省也接着兵临城下。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共产党号召，一致主张武装抗日，收复失地，其当时的盛况是空前的。远在开会以前，有关的人们已陆陆续续地云集南京，几个较大的著名旅馆，已预定一空。京中的达官贵人的公馆，已人满为患。京中的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特别是军统特务，分外地紧张起来。半公开地、秘密地注意各色人物的活动。京沪、京杭、京津、京平各路的客车，下关和浦口的车站，上下水长江大轮的码头，也特别戒严。以保护他最高领袖和其夫人宋美龄女士和四大家族的安全。市上表面安静，但人们稍涉疏虞，即被跟踪逮捕，搜查审讯。

我们这个小小通讯社，表面上也似乎跟着忙碌起来，除孙凤鸣同志一人非常地宁静以外，其余的人员也跟着整齐衣冠，擦亮了皮鞋，灌满了墨水，准备了为党为国（首先是为领袖）宣劳。——这次大会非同小可，最高阶层，日夕研究，如何请求友邦（日寇）在开会期间不能耀武扬威过甚，刺激了我们统治下的人民，使共产党以及跟着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有所借口，对外抗日，对内反蒋，外交上发生为难，难于控制。

关于这次大会特别通行证的问题（记者是特别采访证），决定这一次是归中宣部统一发行的，非官方认可，或是特别要人保证，一般的通讯社能取得一张特别采访证，确是最最不易的。我们除早由中央社代为保证竭力疏通外，并直接向中宣部提出请求，多方动员，得到了中央社、中宣部的朋友们确切的保证，我们始安下心来。

在一九三五年中秋，我们遵照孙凤鸣同志的意见，把他的夫人和侄子安排到香港去了，托由亚樵照顾，亚樵曾作了妥善的安排。我们事前（约在八月下旬）安排凤鸣同志重回上海一次，与他夫人告别。据他回来所说，并未谈及十一月一日的东西，但他的夫人已猜到了，甚为感伤！但无一点牵扯，并誓许照顾他的家人，要他放心。他自沪回京以后，表现得更宁静了。在以后二、三个月的时期里，他特别温和，言语之间也特别阔达，一无悲观表现，笑话也比以前多起来了。这一英雄人物的气度，把大家都感染了，崇拜他的伟大，向他学习。待到十一月一日以前三四日吧（？）他坚决要我提前离开南京，要我注意，最后只留他一个人即够了！

我永远记得我动身之夕，他一定要送我上车。在站台

上，拔出他所用的那只美国造的金笔给我，说是用作永久纪念。我问他：“你不要用吗？”他望着我笑道：“听说这种笔是很名贵的，丢给敌人，岂不可惜？！送给你写战斗文章吧！我这几天一支铅笔即够用了。”这几句话，每一个字都永远记在我的心里，从未敢或忘。

为时不久，车站上打钟了，车子将开了，还是他先伸手和我握别，我不由自主地泣不成声。我回到车上；他站在那路灯下。车子缓缓的开出车站，还看见他向我挥手，直到一无所见为止。我回到二等卧车上铺，泪如雨下，彻夜未眠。

在凤鸣同志死难前那三四天，他随贺坡光同志盘桓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化的时间更多了一些。一般的事务人员，因为他们是很熟的记者，更不以为意，听任他们漫游，一无阻挠。他就和贺同志低声细语，按照过去的党报所载以及国民党印刷品的照片，这些匪徒在摄影的时候，林森坐在哪里，蒋介石坐在哪里，汪兆铭坐在哪里，中央常委坐在哪里，又重新复按一遍。他所见过的图片，贺坡光告诉他的，已深入他的脑海。

七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一百多名中央委员，七点钟去中山陵谒陵，九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完成后，中央委员们集中到会议厅前等候摄影。蒋介石迟迟不来，未及列队，摄影师动手拍照，在九点三十分摄影完毕。

适时，孙凤鸣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他从大衣口袋里掏

出五响左轮式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正中正要转身的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一枪从后贯通右臂，一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应声倒地。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

在慌乱中，汪精卫之卫士还击二枪，孙凤鸣胸中二弹倒地。

稍停一瞬，枪声停了，蒋介石方始下楼，走到睡在地上的汪身旁。汪喘着粗气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刺汪消息传开后，全国轰动。由于蒋、汪交恶，人们怀疑，在戒备森严的中央党部，除了蒋的特务队，还有何人能通行无阻？广西的巨头李宗仁、白崇禧来电责问，似乎蒋大有嫌疑。汪妻陈璧君还抓住蒋不在场摄影这一点，和蒋大吵大闹：“你不叫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孙凤鸣被击倒后，卫兵在他身上只搜出银钞毫洋六角，还有可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泡一枚（应是服用后多下来的一杖），说明他在完成使命后，誓死不求生还。凤鸣因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之。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针十次左右。南京当局为从凤鸣口中获得刺杀的政治背景线索，由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代理部长陶立谦等人亲临病榻，追究凤鸣受谁指使。凤鸣什么也没有讲，只是陈述了他作为堂堂中国人的立场。他承受着肉体撕裂的痛苦，迸发出最后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